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长三角研究系列

JUNHENGZHONGGUO CHANGSANJIAO FAZHAN XINMO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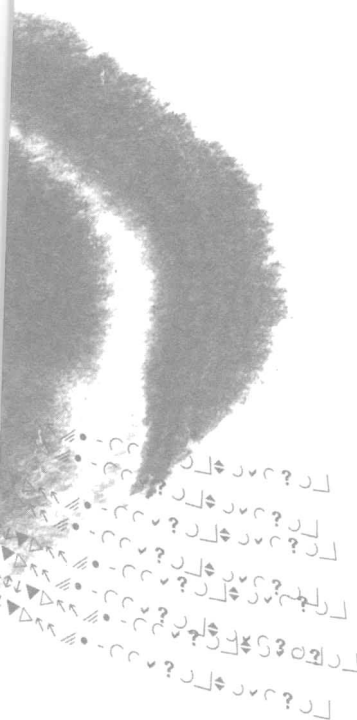
均衡中国： 长三角发展新模式

刘志彪 郑江淮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ZHONG GUO JING JI WEN TI CONG SHU

长 三 角 研 究 系 列

均衡中国：长三角发展新模式

JUNHENGZHONGGUO CHANGSANJIAO FAZHAN XINMO SHI

刘志彪 郑江淮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均衡中国：长三角发展新模式/刘志彪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长三角研究系列)

ISBN 978-7-300-19048-8

I. ①均… II. ①刘… III. ①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6439 号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长三角研究系列

均衡中国：长三角发展新模式

刘志彪 郑江淮 等著

Junheng Zhongguo Changsanjiao Fazhan Xinmo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0.3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8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均衡中国：长三角发展新模式

学术顾问：洪银兴

主编：刘志彪 郑江淮

各章撰写人

序言 刘志彪

第一章 刘志彪

第二章 巫 强

第三章 吴福象 王新新

第四章 王 宇

第五章 刘丹鹭 刘志彪

第六章 时 磊

第七章 刘和东

第八章 吴福象 姜凤珍

第九章 魏守华 张 静 汤丹宁

第十章 魏守华 汤丹宁 周山人

第十一章 郑江淮 芮红霞

总序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 and 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十八大后追赶战略下的 均衡中国与经济变革 (代序)

十八大后的中国全面进入了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时期。从追求发展速度到速度与民生的双重追赶，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重大经济变革趋势。如果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不能从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依赖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经济将出现“滞胀”并陷入发展陷阱。为顺利实现这种“倒逼”经济转型升级的效应，需要我们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的立足点，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动积极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



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采取的是追赶型发展战略。如果我们把过去三十多年来从贫困快速迈向基本小康作为中国实施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的话^①，那么随着 GDP 总量进入世界第二、人均 GDP 接近 6 000 美元，中共提出的“两个 100 年”的目标，就意味着中国整体上进入了以赶超西方中等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第二轮追赶战略。实际上，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有条件走在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地方和作为实施追赶战略的第一方阵，早已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

第一轮追赶战略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②，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老大难问题。党的十八大全面启动了“两个全面”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这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的追赶战略，其定性的内涵是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具

① 本书把追赶和赶超 (Catching-up) 两个词并用。关于赶超战略的内涵，吴申元、王晓博认为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过程”。他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赶超战略思想，把中国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过程视为赶超战略实施的过程。本书基于这一理解论述相对均衡发展问题。参见：《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赶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 (5)。

② 林毅夫、蔡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体表现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除了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经济目标外，在民主与法治、文化软实力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还有更加严格的标准，如提出了社会保障全覆盖、收入差距缩小、医疗服务人人享受、严格环保等新要求。显然，与第一轮追赶战略中把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比，第二轮追赶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五位一体”的相对均衡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实现。

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第二轮追赶战略与第一轮追赶战略相比，在战略的本质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十八大报告判断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的前提下，第二轮追赶战略将会面临或怎样的发展环境？它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根据发展战略的变化改革经济发展体制，以适应发展战略变化的要求？

一、从速度追赶到双重追赶：均衡中国的新一轮战略

中共执政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需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追赶目标。如定量的指标体系从十六大提出追求 GDP 翻番，到十七大提出追求人均 GDP，再到十八大提出 2020 年 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 2010 年翻一番，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一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与 GDP 翻番指标共同写入党代会报告，彰显出今后中国共产党会更注重人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更



加注重追求人民幸福的目标。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十八大报告将十七大报告中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提法调整为“关键”。这一改变并非无足轻重，而是精心谋划。这意味着过去集中资源投放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形成的非均衡发展格局以及所造成的问题，必须在新的相对均衡的发展阶段中予以正视并妥善地解决。例如，收入、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不解决，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有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于发展速度的要求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十八大报告在关于今后经济发展的部署和任务中，没有再继续沿用“加快发展”这个词，即使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也没有要求“加快发展”。^① 这充分说明全党已经高度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必须从过去追求增长速度，转变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的立足点上来。

综合来看，以“两个翻一番”和“两个全面”的目标特征所界定的第二轮追赶战略，虽然与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特征的追赶战略相比，在本质属性上仍然属于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战略，但在许多实质性问题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的背景不同。实施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基本背景是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现实。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成为迅速实现追赶的唯一可以为社会各界接受的发展理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中国的政治诉求和经济政

^① 《杨伟民解读十八大报告经济发展部署》，见 <http://kuaixun.stcn.com/2012/1120/10171200.shtml>。



策倾向于追求速度和数量，就是一种完全可以被充分理解的行为。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也迈上了大台阶。在中华民族逐步崛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调节好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合理关系，在保持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发展实惠。

第二，战略的出发点不同。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出发点是要脱贫。迅速解决贫困是一切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实施非均衡发展。该战略成效明显但也遗留下来许多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这成为第二轮赶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解决这些问题既是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克服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如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仍然遗留着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等。目前全球 70% 的贫困人口分布于中等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家的现实，值得已经步入基本小康社会并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警惕。^① 中国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奉行增长第一的策略，导致了收入和资产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成。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是其他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挣扎，依旧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第三，战略目标的内涵不同。过去的追赶战略，一切围绕发展速度，推动发展的立足点只是 GDP、只有速度，盲目追

^① 参见《中国贫困人口 1.28 亿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见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10/17/content_26828964.htm。



求高速度，甚至互相攀比速度。这造成了我国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积累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的矛盾较多等问题。十八大所确定的追赶战略，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即 GDP 翻番目标是要解决发展速度问题，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充实和内涵的提升，则属于要解决的民生和收入提升问题，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法制、生态等相对均衡发展的追赶战略目标。^① 这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体现为发展速度不再是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的主要目标，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

第四，战略的支撑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才真正启动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开放，走的是出口促进发展的道路。从最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发展到后来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低收入、市场容量小所导致的“市场缺口”，主要是通过出口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来解决的。经过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的开发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后的迅猛发展，使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发展方式的严重的粗放性，必须尽快转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作为发展的支

^① 显然，中国离进入发达经济体中政府专注于民生和公共事务的发展阶段还有不小的距离。在介于小康和基本现代化之间的混合型的追赶目标下，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还会带有一定程度的追赶特征，即我们还不可能完全摆脱“生产型”政府的特征而进入“服务型”政府功能。



撑点，即“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①这不仅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产能过剩的困境，而且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前提，是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市场优势不可能发挥出来。由此凸显了适时纠正非均衡战略、尽快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第五，战略的实现机制不同。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追赶战略，直接导致了强势政府和弱势市场的机制匹配格局，以及依靠“储户、农户、散户、外来户、购房户”的资金来源和集中使用的方式。^②以发展为第一取向的产业政策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几乎所有一切发展矛盾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整体上进入基本小康社会以及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追赶战略目标和内容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变革，而且意味着我们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要把“强政府”与“强市场”有效结合起来，并以此改革发展资金积累的来源和使用方式。我们需要通过“强政府”来消除市场失灵领域的非均衡格局，如消除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实施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给每个人提供共享发展成果的平等机会。我们需要通过“强市场”来消除政府管理过多、管制过

① 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载《南京大学学报》，2012（2）。

② 刘志彪：《追赶战略下中国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影响与改革取向》，载《学习与探索》，2013（1）。



度、管控过死等体制弊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扬：新一轮追赶战略下的经济变革

经过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轨道。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率跌至10%以下，2012年则跌破了8%。未来我们不得不习惯于面对长期的相对低速的增长。实施相对均衡的追赶战略，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影响机理和效应，主要表现在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这一挑战所引发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①我认为转型面对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是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

第一，作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的劳动力价格正在被重估。如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反转，2010年这一指标已经从2008年的41%上升到48%；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上升^②；居民消费

^① 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李稻葵认为，增长的动力和发展格局变化的根源是低端劳动力市场的逆转，其后果包括消费回升、劳动收入和收入分配的逆转、贸易顺差下降以及通胀压力的上升。参见 http://www.xcf.cn/tt2/201301/t20130116_398425.htm。

^② 参见凤凰网的报道：“17省份公布去年居民收入，上海人均超4万居首”，上海、江苏、山东、辽宁、河北、山西这6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跑赢了当地GDP增速，见 <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30125/7603732.shtml>。



占 GDP 的比重自 2007 年起逐年上升。^① 我们的调查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工资，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却在不断上涨。沿海很多地区工资的年增长速度在 20%~30%。显然这一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 GDP 的增速，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 2004 年的 1.5 亿下降到 2012 年的 3 000 多万^②，由此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如果考虑中美两国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考虑到航运成本、隐藏的“冰山成本”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相对于美国趋于收敛，是促进美国“制造业本土化”的重要因素^③，也是中国未来若干年内外贸顺差占 GDP 的比重稳步下降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除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价值都在被重估，中国过去低成本的要素价格正在补涨。近年来，中国各类能源成本的飙升、用地价格的支出水平、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由此叠加上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十八大承诺的民生工程一方面意味着发展重心的转移和将追求人民幸福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外生推动和内生驱动下，面临着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

①② 这个数据经过了修正，参见李稻葵、徐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动力研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讨论稿，2012。

③ Offshoring, “Welcome home”, 见 <http://www.ecocn.org/thread-178115-1-1.html>。



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的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民众利益增长的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三，这一场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会对中国经济自发地产生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冲击，迫使经济出现以“转体制、转方式、转发展的立足点”为主要特征的转型升级需求和压力，同时这个过程的主要副作用是无法避免的通货膨胀趋势。一方面，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本化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动力。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个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包括农产品价格在内的所有消费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同时使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和对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条件下，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创新驱动因素支撑，才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因此它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快车道，但由此经济增速会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周边一些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市场竞争，虽会“倒逼”企业产



业升级，但暂时不能适应的企业会因此而破产倒闭，这是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五，在可能的“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滞胀中，社会可能因此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经济将可能较长期地陷入“低增长、低就业、高通胀”的“滞胀”的漩涡。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显然短期承受这种“阵痛”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化解这种两难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第三产业；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将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三是把以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上。^①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资本调整和劳动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社会必然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中国就极易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陷入发展的陷阱。

因此，我们说要避免陷入发展的陷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说要在相对均衡追赶战略下，如何面对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

^① 蔡昉：《承受短期冲击阵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见 http://www.sznews.com/zhuanli/content/2008-12/21/content_3472800.htm。